



從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省思 台灣新移民子女標記化的問題

林翠玲／桃園縣樂善國小總務主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一、前言

歐巴馬贏了！2008年11月5日，在全世界的關注之下，非裔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跨越了種族的藩籬，寫下美國夢的歷史新頁，成為美國建國232年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的典範是懷抱夢想，力爭上游，打進主流社會，打破種族、教育、工作和政治上的藩籬；歐巴馬的白宮之路，不只對美國人有意義，對於打不破的猜忌與敵意，無法擁抱「你、我不同」的世界各角落，也有相當的意義（孫秀惠，2008）。因而對世界上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國家，更應省思其中的意涵。

台灣這塊土地上，原本存在著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四大族群，近年來，外籍配偶大量進入台灣，改變了人口結構，新移民成為一新興的族群。新移民女性的稱謂是源自於外籍新娘、外籍配偶，在2003年由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的命名活動而來（夏曉鵬，2005a）。稱謂的改變，顯示了台灣社會看待此族群觀念有著轉變的過程，但是台灣新移民家庭的組成，多數居於社會中的弱勢地位，貧窮、體弱、弱智圍繞著這些家庭，且他們在家庭地位、教育程度、社會生活、經濟地位、語言溝通、親子關係、種族因素等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其所產生的問題是一種社會問題，且隨著外籍配偶子女相繼入學，將形成一種教育問題（吳清山、林天佑，2005a）。但是，這些跨海來台的外籍配偶，在原母國，可能自身的條件不錯，也不是智商低下，只是因為婚姻關係來到異國生

活，但是在這裡，卻被歸咎為產出下一代素質低落的「新台灣之子」（夏曉鵬，2005b），此種落差原因何在？

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96學年度台灣的國小學童總數為1753930人，新移民子女之國小在學學生數為90958人，（教育部統計處，2008），新移民子女即佔了全國學齡兒童的5.2%，且所佔比例將逐年攀升。當我們一再關注這些新移民可能是有問題之上，再加上媒體大量負面報導，從學校、社會、教育部門等，無形中都將他們貼上了標記，甚至，有時在校園裡，會聽到小朋友間出現這樣的對話：「我的媽媽是越南人，我又不是，我不是越南人。」文化並無高下之分，我們該擔心的是，孩子應該是認同母親的，認同母親文化的，如Phinney和Chavira（1995）研究指出在美國跨族群或跨國婚姻的子女，如能讓他們吸收父母原母國雙邊的文化，則傾向較健全的身心發展，才不致一味地「融入」主流社會，而長大後卻導致對主流社會的疏離。但在我們這裡，在這些新移民子女的幼小心靈，誰灌輸了孩子優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別？

無論這些新移民是基於何種理由來到這塊土地上，他們亦是我們的國民，不應以他們不同於主流社會的文化，就將其汙名化或加以抑制，未來我們的生活將可能掌握在這些目前所謂新移民子女的手裡；在美國，以白種人為主流文化的社會，能打破種族的疆界，選出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這樣的結果，相信可以讓全世界省思，對於台灣目前



所面臨新移民加入，造成人口結構變遷的狀況，更是有所啟示，該努力思索對於新移民之政策及未來的走向。

基於前述，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藉由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來分析其所經歷過的學習歷程及台灣新移民子女的標記化問題，並經由訪談¹新移民子女、學校教師、校長的回應，來省思台灣新移民子女的標記化問題，藉以對新移民子女之教育問題有所反思及助益。

二、歐巴馬的學習歷程

歐巴馬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其整個學習歷程有其脈絡可循，以下將就跨文化的教育歷程、「我是誰」的認同問題、標記化的問題等三個部份探討。

（一）跨文化的教育歷程

歐巴馬可說是「美國夢」的實踐者，1961年8月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出生，父親是肯亞出生的盧歐族人，以國際學生的身分，到夏威夷大學就讀，認識了白人女子 Ann Dunham，兩人相戀之後結婚，生下了歐巴馬；但當歐巴馬兩歲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歐巴馬跟著媽媽和繼父一起搬到印尼雅加達，在雅加達念小學，四年之後，歐巴馬獨自回到夏威夷，和他的外祖父母同住，並且進入檀香山著名的私立學校就讀，他在學業上相當努力，高中畢業之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並投身公共服務，成為芝加哥的一名社區運動者，後來再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葉柏毅，2008）。歐巴馬身上流著白人與黑人的血液，從小經過多國文化的洗禮，不斷在適應自己與周遭環境、文化、膚色及社經地位的差異，在整個教育歷程上，由於跨文化的經歷及有重視其學習之外祖母及母親，建立他更宏觀的視野，加上

自身的努力，因而能夠破除種族偏見，實踐自己的夢想。

（二）「我是誰」的認同問題

歐巴馬回憶年少時，「我一直努力在證明自己就是壞胚……，我嗑藥是要平復內心，抹去所有記憶，不用再想『我是誰』的問題」，「一股力量在把我推向許多黑人少年最後命定的不幸角色」，但是終於認知到「我的認同或許從我的種族開始，但是不會也不能在那裡結束」（王輝耀、石冠蘭，2008）。歐巴馬在芝加哥黑人區從事公共服務的經驗，奠定了他的理想，這個經驗也強化了他對於黑人的認同，使得他不再受困於認同的問題，曾經由於種族的問題和沒有根而掙扎，黑白混血促使他不斷的尋找認同，導致自我放棄過，但終歸他能跨越「種族」的緊箍咒，為自己的出身感到光榮，在美國這個民族大熔爐中，找到自己的價值，而成為美國的領導人。

（三）標記化的問題

由於從小承受美國社會賦予的標記化，且自身走過種族認同的路，歐巴馬自述，對於他的女兒，他必須提高警覺，避免他的女兒們聽到甚麼有關「這個世界是如何看待他們，這個世界想像他們應該是怎樣」（陳琇玲、潘勛，2008），即便歐巴馬已在美國社會佔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非常明白，在主流社會裡，種族、膚色等對於孩子來說，還是難以跨越的疆界，雖然他自己堅信勝選與否不會是因種族、膚色的影響，而是能力的問題，但對於孩子，依舊擔心世界給予孩子的標記化問題。

綜而言之，由歐巴馬的整個生命歷程看來，他經過了跨文化的洗禮，因而比一般人有著更強勁的生命力、思考力，也證明了種族並不會決定聰明才智，須用努力打敗種族

¹ 受訪人員皆為桃園縣人員，A, B為新移民子女，C, D為教師，E, F為校長。



賦予的種種標記，不禁給了全世界所有教育工作者反思的機會，美國可以出現一位「歐巴馬」，而且他還是處在白人中心的種族主義，認為只有白人文化是客觀和中立的場域裡，而台灣呢？基本上，外籍配偶來到台灣，在這塊土地上，還沒有明顯可見的膚色的問題，但是在存在著主流社會所賦予的標記化及文化高低的問題上，該如何教育新移民子女？如何讓這些新移民子女有機會透過自身努力去實踐夢想？應是教育當局該仔細思索的。

三、台灣新移民子女的標記化

對於台灣新移民子女標記化的問題，以下就標記理論、主流社會給予的標記化、學校環境給予的標記化、自我標記等四部份來作探討。

（一）標記理論

貝克於1963年出版「局外人」（The Outsiders）對於標記理論²作有系統的闡述，使得標記理論發揚光大，貝克的標記理論有三個要點：一是重新解釋偏差行為的成因、二是標記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三是被貼上標記之人，馬上以此標記做為他「最有力的身份」（master status），並且取代了他所有的其他角色（鄭世仁，1994）。吳清山、林天祐（2005b）指出標記理論是解釋個人形成偏差行為的一種主張與論點，認為違反社會規範或團體規定的行為，是經由訂定社會規範或團體規定的權威人士，對個人貼上「偏差」的標記之後所產生的，也就是說偏差行為是社會造成的，並不是這些人天生就是壞胚子，天生就會做壞事，也不是永遠只會做壞事。

標記理論強調社會群體對某些人士行為的態度，決定該行為的善惡，通常決定者是

社會上有權勢的一群人（陳秋麗，2005），因而主流社會掌握了標記的結果，也具有宰制性的決定，在教育現場上，則是教師常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去標記化學生，而引發了一些教育問題。

標記理論被廣泛地應用在教育上，如身體外表、行為上、種族的劣勢，常常就會被貼上標記，因而在特殊教育、身心障礙者、偏差行為等就有許多相關研究。Silver和Harkins指出（2007），很多的研究顯示標記化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低期望、負面判斷的增加、同儕汙名化、低自我評價及行為問題的增加；而正面標記，如「有天賦的」，被描述為有複雜的影響，這樣的孩子會感受到成就感與獨特性，而且也會感受到期望的壓力、較少的成人支持和較高程度的社會壓力。大部份標記化影響的研究，支持標記化是套用陳規且是重複的行為，引發不良的影響，在影響教師的判斷上，最有影響力的是學生個別之成就和行為，在推測上，常超出正式的標記之外。

Apple在《意識型態與課程》中指出，老師對待學生能否一視同仁，似乎受主觀意識、社會意識的宰制，處理學生、判定學生成敗時所使用的思考類別，都涉及到一種社會評價的過程，而標記是我們將價值應用於自己與學生行動上最後的產物（王麗雲，2002）。以新移民子女來說，他們承受來自先天的限制，與主流社會群體之文化資本不同，而社會往往是受到歷史與意識型態的制約，將新移民群體標記化，學校中的人員亦常受制於僵化的意識型態對新移民子女標記化而不自知。

（二）主流社會給予的標記化

在美國，大量的移民者，縱然有民族大熔爐的美稱，但是，黑人和拉丁裔的美國

² 標記理論（Labeling theory）亦稱標籤理論，本文採用王麗雲（2002）在《意識型態與課程》之用法。



人，都被資本家透過區隔化的勞力市場極度的剝削，更甚者，黑人女性被父權的白種人優越主義信徒貼上「下種的母馬」和「坐領救濟金的皇后」等標記，這些父權的白種人優越主義信徒所制定的教育和社會政策，系統性的將黑人女性和拉丁裔的女性排除在各種機會之外（蕭昭君、陳巨擘，2004），具有「非典型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少數民族被貼上標記的比例，一直是佔多數（王麗雲，2002）。Talbot（2008）研究美國成年人，其父母為少數種族之個人自我標記化的經驗指出，無論他們在自己內心或對於其他人，如何地認同他們自己，仍然會因外表而被標記化，這些固定的外在標記化來自於家庭、親密的朋友、教師職員、陌生人和學生事務專家。也因為他們是少數種族，很多人經驗到疏離，也感受到較多來自白人、主流群體的歧視。

外籍女性原來抱著改善生活的希望進入新國度，台灣成了東南亞女性想望的富裕國度，但當這些外籍配偶移入台灣之後的生活，卻是那樣的艱難（夏曉鵬，2005b）。造成如此結果的原因，很多的因素是由於他們是資本主義之下，投資與報酬交換下的附屬品，他們也是全球化趨勢下的產物，也反映出我們國內特殊社會結構的需求，因為這些新移民的特殊境遇，再加上媒體的負面報導，我們的主流社會就將他們貼上了標記，在承受了強烈的標記化之後，當他們開始孕育下一代，政府安排她們不斷的產檢，彷彿她們的身體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透過國家權力確保「國力」的強健，在在顯示對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與偏見（夏曉鵬，2005b）。國家部門尚且存在此種「標記化」的作法，遑論一般社會大眾，能不將這些新移民女性貼上「標記」嗎？且研究顯示，很多的家庭裡，母職幾乎代表親職，女性為家務分工與育兒的主要工作者（陳富美、利翠珊，2004），由

於母親在教養上的重要性，新移民子女因母親大多來自於主流社會認為較落後的國家、落後的文化，屬於台灣非典型的社會文化背景，因而主流群體即將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桃園縣兩位校長對新移民子女及其家庭即表示了如下的看法：

會娶外籍配偶的人，一般而言都是屬於相對的弱勢，所以外配子女的問題很多是來自家庭的問題……。跨國婚姻具很高的比例為偏鄉地區，或是父親學力不高、身心障礙等……。外配子女是異文化結合的下一代，在台灣傳統主流文化意識氛圍中，極易被標籤化及污名化，在原罪下出生，所要面對的就是對母親文化認同的衝擊，尤其是在台灣欠缺多元文化包容的社會價值下，對其成長過程已形成一定的壓力（訪E980118）。國人總是以有色的眼光看他們，只因我們對於東南亞文化過度的自大……。一般人都認為新移民子女比一般孩子差，有很大的原因是聽自於媒體錯誤的報導，因為現代人太相信媒體，但是外籍配偶子女是少數，只要有成績較差者就顯得突出，台灣一般孩子成績表現差著也很多啊，只因台灣一般孩子人數多，比較不顯現而已（訪F980119）。

對於新移民子女而言，母親母國的文化、語言對他們有沒有特殊的意義，自己的家人又是如何看待這外來的文化？台灣的主流群體，向來是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新移民，自然而然對於這些國家的語言、文化也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如曾在母親母國居住，後來才移居到台灣和一直居住在台灣的新移民子女對於母親母國的語言表示：



媽媽常常和她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在一起就會講越南話，可是爸爸說要說國語這樣比較好，人家才不會笑我們，所以我和媽媽就很少講越南話了，但是有時候爸爸不在的時候會說（訪A971222）。

我不會說媽媽的話，媽媽也不會和我說（訪B971223）。

以這樣的狀況看來，家庭裡最親近的家人都不看重同為家人的另一種文化，不希望這樣的文化在家裡延續，社會上的一般大眾的想法能更超脫，會有更寬容的心胸去接納嗎？有些社會上的人士，在談論這些新移民子女時，常憂心忡忡地表示，「這些小孩很可憐，家裡環境不好，又沒人管，長大以後會成為社會的亂源。」這樣的標記，未免也太沉重了。

（三）學校環境給予的標記化

隨著新移民子女漸漸進入學校教育階段，蔡榮貴、黃月純（2004）統整新移民子女可能面臨的問題有：外籍媽媽教養子女，心有餘而力不足，特別是在課業教導方面；家庭、親職教育功能不彰；經濟困難，生活與學習環境較差；易被種族歧視，缺乏自信產生疏離；學齡前即有學業適應不良問題產生；教育資源不足，教師意願與動機需要提升；跨部會與跨局處的策略整合有待建立。陳玉娟（2006）亦指出而其所面臨的教育問題中，以學業表現、學習態度、語言溝通、本身自信、文化適應及解決問題能力等問題較為嚴重。

鍾鳳嬌、王國川、陳永朗（2006）針對屏東地區外籍與本國籍配偶子女在語文、心智能力發展與學習行為之比較研究，外籍配偶子女較本國籍配偶子女在語文方面有顯著落後的情形，在心智能力方面也有些許落後的差異，在學習行為上則沒有顯著差異。在

學業成就方面，研究顯示，外籍暨大陸配偶學童子女的國語文能力與本籍配偶學童子女之間有明顯的差距（林璣萍，2003），普遍以「國文領域」表現最差，其次是「數學領域」（楊淑朱、邢清清、翁慧雯、吳盈慧、張玉巍，2004）。趙善如、鍾鳳嬌、江玉娟（2007）則更進一步指出，注意與記憶、理解與表達學習行為能力、家中經濟情形與母親識字程度是影響外籍暨大陸配偶學童子女國語科、數學科的重要關鍵因素。教育部亦基於有關外籍配偶子女研究常礙於研究樣本過少，讓研究結果使得這些外籍配偶子女被貼上「先天素質較差」之錯誤印象，於2005年對全國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做抽樣調查指出，受訪學童學習表現優良者首推語文領域，數學則殿後，在校生活適應狀況裡，上課學習互動不良比率較高（教育部統計處，2005）。另外的研究則發現，外籍暨大陸配偶學童子女，其學業成就不比一般差，有四成者成績相當好，為全班成績排序的前三分之一，而表現較弱的比例則和一般差不多（陳烘玉、劉能榮、周遠祁、黃秉勝、黃雅芳，2004）。陳美瑩（2008）研究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學業成就之相關因素亦發現，外籍配偶子女學業成就與台灣之子沒有差異，家長的關懷與輔助可能是主要因素。

由上述研究可知，在課業上，新移民子女的表現似乎呈現兩極化，有部份是無論在功課、行為上都表現得很好，甚至學業表現在班上名列前茅；另一部份則是在各方面屬於較落後的一群；但是社會、學校常將其標記為「先天素質較差」，而不細思新移民家庭組成背後之問題，此實為教育的一大問題。

學校本身是個小型社會，學生在這裡開始學習社會化，學校的目的是要引導孩子朝著真、善、美發展，同儕間也許承受了大



人複雜的世界，會對特殊的孩子壓迫，給予這些孩子標記化，學生的認同完全是由教師在教室中對學生的知覺所創造的（王麗雲，2002），從而造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但由研究得知，新移民子女在學校的表現，並不全是落後的，因而老師便須在學生社會化的過程扮演關鍵的引導角色。王世英、溫明麗、羅天豪（2007）在外籍配偶子女補救教學模式之建構，即特別著重在教師角色的重要性，認為教師必須是位有能力自我反省、解放刻板化印象之錯誤意識型態的批判思考者。

學校裡之新移民子女對於學校生活的感受如何？其反應如下：

我兩年前才到台灣，原來一直跟外公外婆住在越南，這裡比越南好，我也喜歡這裡，剛到台灣來的時候，同學動不動就說我「越南來的」，那時候心裡會難過，現在比較不會了……有些同學不太好，會欺負我，我有些話講得不好，他們也會笑我，還學我說（訪A971222）。

媽媽一直跟我說讀書要認真一點，我自己上課很認真，我沒有覺得同學對我有甚麼不一樣的（訪B971223）。

其中一位經歷過兩個國家生活的新移民子女覺得在台灣過的生活比在原母國要好，雖然會想念原來的國家，但還是比較喜歡這裡，但卻對於學校的生活、同學的對待較難以適應；而另一位自出生就居住在台灣的新移民子女則覺得自己和一般同學沒有甚麼不同，而且反而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更努力去做。

在現場直接面對學生的教師，對於新移民子女的看法又是如何？班級裡有外配子女的教師即表示：

我們班很難帶，你看，全班20個人，外配子女就有5個，家裡都不管，注音符號怎麼教都教不會，這次的全班平均就很低，不過，沒辦法啦，家裡都沒人管啊（訪C971228）。

我班上有好幾位外配子女，有些外配子女的成績也很好，可是喔，實在不知道我們這裡的小孩在做甚麼？成績竟然比他們還差（訪D980120）。

這樣的言談之下，隱含著教師早已在潛意識裡將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無論表現得好或壞，都歸因於他們是新移民子女。而如吳清山、林天佑（2005b）指出刻板印象在標記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個人對某類人具有負面的刻板印象，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很容易就把他貼上標記，經過「自我應驗的預言」效應，讓其走上不歸路。學校裡，老師往往在不自覺中，把學生分類、標記，將階級、經濟上弱勢的學童標記為知識上或社交上的能力不足（蕭昭君、陳巨擘，2004）。多數非典型之社會文化背景和少數族群的學生在學校生活中被分類和標記，部分老師給予孩子標記化，甚至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就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處遇，如Apple提出：

分類和標記是否真的在幫助小孩，各界一直爭議不斷，……，學校生活的實際、學校在大量生產社會經濟機器所「需要」的特定文化資本與行動者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將學生界定成需要某種特定處遇等作法，事實上是傷害了他（她）。……幾乎所有對於這個人的行動都受到這個定義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個定義也影響了學生本人對他人的行為，最後則支持了自我應驗的預言（王麗雲，2002：209）。



教師將學生標記為須要特定處遇的對待，須要非常小心處理這樣的標記，鄭世仁（1994）指出每位為人師表者應該對「標記」的可怕與無情有深刻的瞭解，並能避免以標記來傷害學生。標記的可怕在於它使人喪失自尊、抬不起頭來、到處碰到冷冷的眼光，最後放棄了個人原有的自我形象，接受了另一個原先不肯接受的自我觀念。在學校方面就該注意到學校究竟如何矛盾的一邊強化學生自我增能，一邊又在壓迫學生，這種矛盾是必然的，或是說它是需要嚴肅檢視的過程呢？（蕭昭君、陳巨擘，2004），所以當教育者自認為是幫助這些孩子的同時，實質上是真正給予幫助，還是抹殺他們的能力？又如Apple所言：

學校中利用專家、臨床、心理與治療的觀點，評鑑，以及標記的程序，……，其中所隱含的語言型式與觀點，並不是「協助」的工具，而是學校用來使抽象個人無名化，並加以分類到預定的社會、經濟與教育的空格中，所以這些標記的過程往往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型式，……，當權者的文化資本被視為是自然的而加以使用，提升了假意識與經濟和文化控制，當我們忙著去「幫忙」時，便抹殺了多元特質，忽略了人類互動中衝突與驚奇的重要性（王麗雲，2002：194）。

由上述可知，居於弱勢地位，處於雙文化脈絡下的新移民子女，其實他們應該比一般孩子更具有多元的特質，但是實際卻是他們除了本身弱勢之外，更承受了來自於媒體負面報導、學校及社會所賦予的標記化，最終，此標記化又將影響其行為，抹煞了自我的多元文化特質。

（四）自我標記

Talbot（2008）在「父母是少數種族的個體之自我標記化」之研究指出，從孩童到青少年到成人，種族標記內在化之自我標記會改變。標記理論者認為，一個人受到標記後，其中一個主要效應為自我形象的修正或自我應驗的預言，亦即當外在的標記力量強化時，他就會重新評估衡量自己的身份，也跟著會修正自己的形象，在自我形象的形塑中，重要他人的標記化會造成重大的修正及影響（陳秋麗，2005）。鄭世仁（1994）亦指出標記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標示作用是依人、依事、依地、依情況而有差異的，被貼上標記之人，不論其為犯罪、毒癮者、妓女或笨學生，馬上以此標記做為他「最有力的身份」，並且取代了他所有的其他角色。如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針對「新移民媽媽」親子教養問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新移民媽媽最感困擾的教養壓力來自「孩子被標記化」（劉怡伶，2008），這些新移民媽媽也許感受到，「標記化」不僅會影響到別人對孩子的看法，更會因為被人孤立、冷落、嘲笑的結果，影響到孩子的自我形象，由此，被貼上標記之人，只能生活在標記的陰影裡，終至產生「自我應驗的預言」。

個人的認同和社會形成交互作用，在個別的個人認同脈絡裡，他們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選擇標記化加諸在他們身上，不論來自何種文化，標記是人們如何知覺他們的認同和哪種標記化是可接受的關鍵因素（Hoy，2005）。在教學現場，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孩子缺乏自信、找不到自我認同，這當然有孩子自身的原因，但另一很重要的因素則是因為別人的看法，而形成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對於新移民子女而言，常因媒體的不當報導及社會對外籍配偶的偏見，使得外界對新移民家庭「標記化」，這樣的標記化使得孩子在未進入小學就提前感受到「被標記化」的



心理壓力，致使孩子產生自卑心理（周新富，2006），若是周遭環境的人因其先天的因素，將他們貼上了標記，這些新移民子女知道別人看待他們是不一樣的，一些自我意志力較薄弱的孩子，個人會慢慢內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自我標記化，如此，可能就因無法突破，而活在標記的陰影裡。如新移民子女即表示：

我不知道同學為甚麼要笑我？為甚麼要欺負我？因為我是越南來的嗎？
（訪A971222）

這不禁使我們擔心，新移民子女本身的際遇已經讓他們要比一般孩子須具有更大的韌性來適應這個社會，小小心靈卻道出，因為來自於東南亞國家，而遭遇到同學的不友善對待，這將造成他的自我標記化。

綜上所述，由標記理論、主流社會、學校環境、自我所給予的標記化可知，這些新移民子女只因為母親來自台灣主流社會所認知為較落後的國家，而將他們定位為「有問題」者，但實際是因新移民家庭組成，就已存有潛在的問題，這些孩子本身和一般孩子是沒有差異的，但是標記化後的結果卻是抑制這些孩子的發展，而導致命定的不幸，因而當我們在關心新移民子女的表現時，除了關注改變可能性較低的家庭社經地位之變項，更須關注具有高度可改變性的學童本身學習行為發展（趙善如等人，2007），而不是對這些新移民子女貼上了標記，以刻板印象認定他們比一般學童差，該如何發揮教育的功效，讓這些新移民子女透過自身的努力來實踐夢想，將是教育人員亟待努力的，這也是學校教育可著力之處。

四、對台灣新移民子女標記化的省思與建議

（一）去除標記化的作為

目前教育部積極對弱勢群體辦理推動各項教育政策，如「教育優先區」、「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原意是為彰顯教育正義，縮短國中小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落差，另外，內政部兒童局亦為協助外籍配偶及弱勢家庭兒童有關語文及學習發展能力所需之有利環境，充實學前準備以強化社會適應，減緩其日後學習之障礙，於2005年推動「外籍配偶及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計畫」（內政部，2005），但是在推動這些計畫的同時，皆將外籍配偶子女列為需要扶助的對象，這樣是不是在公部門就已落入將新移民子女「標記化」的陷阱？這些積極的作為是必要的，但列為計畫對象的指標應予以去除，不是因為身分別，而是因為實際上是需要扶助的。

對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無疑是將問題歸因於他們本身，而容易導致教育人員忽略了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教學現場方面，教師必須培養批判性的思維，用心去傾聽新移民子女內在的聲音，真正落實多元文化，教育一般學生及教師尊重、欣賞、接納其他族群的文化，讓每個孩子具備多元文化價值觀，讓弱勢族群的文化與主流文化平衡發展，才能去除標記化。

由於國人對於新移民的認知常是來自於媒體錯誤的負面資訊，因而在學校教學方面，須要進行媒體識讀教學，教導學生去批判媒體報導的真偽，不要因為媒體大量的負面報導，即不假思索將新移民子女貼上不好的標記。另外，教師主導著學生的認知與發



展，教師的態度更是影響著每一位學生，教師必須尊重每一位學生，因而教師的再教育更形重要，舉辦教師進修活動，讓教師具備有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將多元文化融入於教學中，因應全球性之多元文化，才能公平看待新移民子女。

（二）重視跨文化的經驗

注重新移民子女父母雙方兩種種族傳統的重要，透過學校課程、介紹文化慶典來瞭解或認知新移民母國的文化傳統。歐巴馬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跨文化的經驗可說功不可沒，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經貿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密切，因而對於新移民子女而言，其母親的文化及語言，反而能助其開啟面對世界的另一扇窗，注重這些新移民原母國的語言與文化，累積文化資本，將是這些孩子未來的優勢，亦能藉此建立新移民子女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自信心，而對於一般學童而言，則要引導重新看待不同國家語言及文化的美麗。

在實務上，很多學校會舉辦多元文化活動，如辦理異國風情、異國飲食、異國文物展等是非常值得鼓勵的，政策的制定方面，應考慮到讓新移民母國的語言及文化，亦能在台灣發展，可仿照台灣少數族群之原住民族語認證、客語認證的模式，延續新移民之語言，讓語言成為新移民子女的利基；並定期舉辦新移民之全國性大型文化活動，可仿照原住民之豐年祭、客家文化節等，舉辦新移民國家的博覽會，不僅讓社會瞭解新移民文化，更讓新移民子女認同母親的文化，使得台灣成為真正的多元文化國家。

（三）強化新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

歐巴馬身上流著白人與黑人的血液，從小在自我認同上遭遇困難，但是他努力讀書，努力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並以自己的出

身感到光榮，終能打破種族的藩籬，逃離命定的不幸。台灣的新移民子女又何嘗不能如此呢？應該要引導他們思考「我是誰」的認同問題，此乃處於新環境下把握自己以及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期望孩子會以自己有不同國家的母親為榮，而不是我和別人不一樣。在學校方面，應強化學校行政輔導支援系統，建立具有關懷、自主、尊重之校園氛圍，適時辦理各項輔導活動，如強化親職教育，讓肩負家庭照顧重擔之新移民增能，配合親職教育辦理異國美食料理、異國風情等，建立新移民子女的自尊與自信，強化新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

五、結語

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對於非裔種族而言，無異是完成了一個夢想，對於白人主流的霸權社會而言，則不啻是重重打了一記耳光。非裔種族之於美國、新移民子女之於台灣，他們常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且在這個多元的時代，主流社會對於他們，經常不經意在各地、各場合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並將其標記化，雖然在當今教育現場不斷強調多元主義，要教育他們認同其自身的文化，但處在父親及母親之雙文化的脈絡裡，各方面弱勢的狀況下，其自身有多少的力量能不被社會的洪流所淹沒。而在教學現場，由於部分教師欠缺批判性的教學能力，或是對多元文化的認知不足，依然對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教師如此，學生們就更不可能培養出批判思考的能力及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追本溯源，從學校開始，進而到主流社會，無論是在心理上或是實質上，應去除對這些新移民子女貼上標記的作為，真正敞開心胸接納他們。



參考文獻

- 內政部（2005）。外籍配偶及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計畫。2008年12月25日，取自http://www.cbi.gov.tw/CBI_2/。
- 王世英、溫明麗、羅天豪（2007）。台灣人口結構變遷之外籍配偶子女補救教學模式建構。教育資料與研究，74，73-96。
- 王輝耀、石冠蘭譯（2008）。Barack H. Obama著。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台北市：時報出版。
- 王麗雲譯（2002）。Michael W. Apple著。意識型態與課程。台北市：桂冠。
- 吳清山、林天佑（2005a）。外籍配偶。教育研究，135，156。
- 吳清山、林天佑（2005b）。標籤理論。教育研究，134，156。
- 周新富（2006）。家庭教育學-社會學取向。台北市：五南。
- 林璣萍（2003）。台灣新興的弱勢學生—外籍新娘子女學校適應現況之研究。國立台東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縣。
- 夏曉鵬（2005a）。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論文發表於世新大學主辦之第二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公民身分、認同與反抗」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辦，台北市。
- 夏曉鵬（2005b）。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市：左岸文化。
- 孫秀惠（2008，11月10日）。歐巴馬傳奇。商業週刊，1094，116-144。
- 教育部統計處（2005）。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結果摘要分析。2008年12月25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brief.pdf。
- 教育部統計處（2008）。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佈概況統計。2008年12月25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son_of_foreign_96.pdf。
- 陳玉娟（2006）。臺灣地區外籍配偶子女教育政策及其執行之研究—以國民教育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陳秋麗（2005）。標籤理論與成人心智障礙者之照護歷程—母親的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陳美瑩（2008）。台灣之子與新台灣之子各有千秋？影響新移民女性子女學業成就之相關因素探討。論文發表於新竹教育大學主辦之「全球化趨勢下的教育革新與展望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新竹市。
- 陳烘玉、劉能榮、周遠祁、黃秉勝、黃雅芳（2004）。台北縣新移民女性子女教育發展關注之研究。論文發表於國立嘉義大學主辦之「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學術研討會，嘉義縣。
- 陳富美、利翠珊（2004）。夫妻的育兒經驗：親職分工與共親職的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4），1-28。
- 陳琇玲、潘勛譯（2008）。Obama Barack Hussein著。歐巴馬勇往直前。台北市：商周文化。
- 楊淑朱、邢清清、翁慧雯、吳盈慧、張玉巍（2004）。雲林縣外籍女性配偶子女在校狀況之調查。論文發表於國立嘉義大學主辦之「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學術研討會」，嘉義縣。
- 葉柏毅（2008年11月6日）。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總統:巴拉克·歐巴馬。中廣新聞網。線上檢索日



- 期：2008年11月8日。網址：<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106/1/18ypf.html>。
- 趙善如、鍾鳳嬌、江玉娟（2007）。影響外籍暨大陸配偶學童子女學業成績關鍵因素：以個人人口特徵、學習行為能力、家庭環境探討之。教育心理學報，39（1），129-147。
- 蔡榮貴、黃月純（2004）。台灣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與因應策略。台灣教育，626，32-37。
- 鄭世仁（1994）。淺談貝克的標籤理論對教育的啟示。教育資料與研究，1，31-36。
- 蕭昭君、陳巨擘譯（2004）。Peter McLaren著。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台北市：巨流。
- 鍾鳳嬌、王國川、陳永朗（2006）。屏東地區外籍與本國籍配偶子女在語文、心智能力發展與學習行為之比較研究：探析家庭背景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37（4），411-429。
- 劉怡伶（2008年4月1日）。新移民媽媽最擔心孩子被標籤化。中廣新聞網。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2月25日。網址：<http://www.cooloud.org.tw/node/18638>
- Hoy, D. (2005). Learning in a bicultural context : A biographical case study . Australian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45(2), 209-222.
- Phinney, J. S., & Chavira, V. (1995). Parental ethnic socialization and adolescent coping with problems related to ethnicit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5(1), 31-53.
- Silver, C., & Harkins, D. (2007). Labeling, affect, and teachers' hypothetical approaches to conflict resolu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8(4), 625-645.
- Talbot, D. M. (2008).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and self-Labeling of mixed-race individuals with two minority parents.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123, 23-31.



專

論

